

中日學者「中國大陸問題」座談紀要

本刊編輯室

中日兩國廿餘位學者，為共同研討中國大陸最近情勢及其未來發展，於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四至十六日在本中心舉行了為期兩天的座談會（名單附后）。座談會係以「中共十二大所面臨的問題」為主題，分成（一）黨政（二）經濟（三）對外關係及四「林、江集團」受審四個單元，進行研討。特由本刊作成紀要，藉供讀者參考。

第一單元：中共黨政問題

第一次座談會係由蔡主任維屏主持。首先，蔡主任提供三點意見：（一）毛澤東死後，大陸上雖曾出現華國鋒、鄧小平、葉劍英「三頭馬車」式的所謂集體領導，但實際上派系鬭爭，迄未終止。兩年來，多數研究中國大陸問題學者認為鄧終將把華「架空」，現在看來華被「架空」之後，仍不免喪失其黨「主席」職位，而下一回合則可能是鄧與葉鬭。（二）在經濟方面，中共「四個現代化」不能成功之原因，除缺乏技術和資金外，最主要的是大陸農工大眾沒有工作的興趣，更沒有擔任工作的知識和能力。大陸教育失敗，農工大眾知識低落，連普通機器都不知如何使用，又怎麼能加入「現代化」工作的行列呢？（三）中共審判「林江集團」，是一連串仇恨與報復的一環，同時也想塑造「法治」的假像。

以下為與會學者自由發言。

（一）郭華倫：中共「十二大」面臨的矛盾與鬭爭

今年（一九八〇）二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議提前召開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規定出席代表應於本年十一月選出；黨章「一九八〇年四月修改草案」亦於四月二日發給全黨討論，討論結果須於九月底前上報。因此一般估計，中共「十二大」可能於年底或明春舉行。

最近香港之中共刊物及新聞社透露：「十二大」將延至農曆年後即明年二月或明年三至五月舉行；證諸大陸出席代表選舉僅有黑龍江一省於十一月選出（西藏則定於明年元月開會選舉），「十二大」之延後舉行，殆無疑義。

「十二大」之延後舉行，可能有兩個敏感問題遲未能取得協調，是其直接因素，即審判林、江集團與研討新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決議」。

林、江集團主犯的審判，初為單審四人幫，後來為了保毛，才擴大為公審林、江集團。原定九月舉行，結果因一再預審均不理想而延至十一月廿日始行開審。此一公審，除可標榜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及藉平民憤外，主要作用是貶毛（審判「文革」罪犯，而「文革」為毛所發動與領導的），但也有保毛作用（林圖殺毛，毛變為被害對象）。不過，不管中共當權派如何把路線與罪行分開，把毛、江分開，圖為毛卸却責任，但人盡皆知，毛澤東是「文革」十年浩劫的主犯，審訊林、江同時也是公審主犯毛澤東和中共。

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均曾說過，今年內中共要對若干歷史問題作出正式決議，其中當以評定毛澤東之功過為中心，這是爭論最多，最不易取得定論的問題。據中共刊物透露，該項決議分五部分：(一)三十年的成績；(二)三十年的經驗教訓；(三)對文革的評價；(四)毛澤東的功過；(五)前景。該項決議原定兩萬字，九月定稿，後來寫出六萬三千字，曾九易其稿，無法按期完成，乃預定今年十一月再作修改，十二月定稿，提交十二月廿五日舉行之六中全會討論，明年再送七中全會通過後提交「十二大」討論。

中共「十二大」的延期召開，除上述兩個問題的影響外，主要的還是中共內部的許多困難與矛盾，一時無法協調解決。分別說來，「十二大」面臨如下的矛盾與困難：

1. 關於思想路線問題。本來是以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現在因為要批毛，對毛思想改採抽象肯定，具體否定或各取所需的手法；同時又說毛思想是集體結晶，不是毛個人的創作，還有指導意義，不能一概否定。一方面要批毛貶毛，否定毛思想的錯誤部分，接受與繼承其可行部分；另一方面又要把毛思想和毛本人分離，說這是集體結晶。究竟那些是正確的，那些是錯誤的，那些是個人的，那些是集體的；究竟有什麼具體事實證明那些文件、思想是集體創作？同時在集體與個人之間，應如何「一分為二」、「合二而一」或「實踐檢驗」毛思想？這是「十二大」不易解決的難題，也是當前中共內部思想混亂的根源。

2. 關於政治路線問題。打倒四人幫後，華國鋒提出抓綱治國，一年初見成效，三年大見成效。「十一大」（和五屆人大）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十年規劃。對此，鄧小平在今年一月十六日「關於目前形勢和任務」講話中，還說「前兩年是為三中全會做了積極的準備」，「沒有那兩年的準備，三中全會明確地確立我們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是不可能的」。可是曾幾何時，現在中共的說法又改變了，說是「十年浩劫與兩年失誤」，把打倒四人幫後的兩年評估為「失誤」，即把華國鋒的抓綱治國和「十

一大」路線說成是錯誤路線，只有十一屆三中全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確立了正確路線。「十二大」對此將作何解釋？華國鋒、葉劍英是否要對「失誤」路線負責，這又是一個難題。

3. 關於組織路線問題。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起，中共倡導反對個人迷信及個人專斷，主張集體領導與黨政分開；改革領導體制，取消幹部特殊化，要求幹部年輕化、知識化與專業化；號召全黨遵守「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廢除終身制，成立顧問委員會，建立離休制度等等。可是許多幹部還是獨斷專行與特殊化，還是投機倒把、貪污腐化、吃喝玩樂，尤其許多老幹部仍高踞要津、戀棧不去，八十四歲高齡的葉劍英仍任人大委員長就是一例。所有這些，又是「十二大」面臨的難題。

4. 關於經濟政策問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取消十年規劃，轉入八字方針的調整政策，這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佔絕對優勢下、容許與放寬個體經濟並運用資本主義方法的新經濟政策。陳雲說：「這是危險的讓步，一個搞不好，會回到資本主義社會；這一讓步的代價就是這麼大，但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現在大陸上許多人包括中共的黨員幹部提出詢問說，既然社會主義制度優於資本主義，公有制優於私有制，爲什麼要放寬資本主義的個體經濟？爲什麼要學習資本主義方法，仰仗資本主義的支援？過去消滅資本主義經濟是不是錯了呢？這也是「十二大」要正確解釋的問題。

此外人事安排的協調，更是最大的難題，往往要經過激烈的鬭爭求解決的。回顧中共「十一大」之後，鄧小平派着着進攻，華國鋒派節節退守，凡是派小四人幫汪東興等被解職後，華派高階層幾乎瓦解，逼使華國鋒傾向葉劍英，由於鄧派的進攻，波及葉派，華葉兩派有聯手抗鄧趨勢。據香港中共刊物透露：五中全會後，鄧小平請李先念、聶榮臻勸葉辭去人大委員長，葉劍英當即拂袖而去，旋南遊廣東等地，拒不參加劉少奇追悼大會。由此，「十一大」建立的中共三頭馬車的領導體制已經失去平衡，三大派系有重新組合的趨勢，「十二大」或可見其端倪。

目前如僅就貶毛、批毛、保毛作爲劃分派系重組的徵兆，那麼，有新的三種不同傾向表現如左，姑且以「派」名之：

貶毛派：陳雲、彭真、譚震林、薄一波、陸定一等。

批毛派：鄧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

保毛派：葉劍英、華國鋒、許世友等。

貶毛派認爲毛澤東開國有功，建國有錯，文革有罪。批毛派認爲功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保毛派則認爲功大過小。這一問題，「十二大」前六中全會以及「十二大」必將展開劇烈的論爭。

華、鄧鬭爭，華派挫敗，華國鋒本人也因公安部長任內案件、天安門事件、學大寨運動，首提兩個凡是等等而不斷遭受抨擊，就目前情勢研判，「十二大」選舉時，華國鋒再度當選主席的可能不大，鄧小平或胡耀邦有接任黨主席的可能，不過，這又是一場激烈的奪權鬭爭，所謂「安定團結」的局面是不會出現的。

(二) 竺原正明：

中共面臨之黨政問題，一如其他共產政權所面臨之問題。目前波蘭情勢極為嚴重，自由工會之興起，適足顯示出大多數波蘭勞工不支持社會主義體制，並盼其早日結束。又蘇俄一九八一年經濟計畫所定的成長率，較一九八〇年降低一半，僅為百分之四，西方觀察家認爲此一目標，亦難達成，以後且可能停滯不進。此種經濟衰退現象，在其他共產國家普遍存在，中共也不例外。

(三) 李廉：

中共政治路線之分歧，不但在高階層，就是在基層也很嚴重。「十二大」代表的選舉，原定在今（一九八〇）年底完成，但迄今尚無眉目，恐到明春亦難辦妥，這便可反映出中共基層的分歧情況。在此項選舉中，華、鄧、葉三派必將形成激烈的爭奪，而未來中共領導人物又須由這些代表來選舉，鄧小平能否在此基層鬭爭中贏得全面勝利，仍難預料。又中共現有三千八百萬黨員中，有一千八百萬係於文革期間入黨，鄧派可能要加以整頓清洗。這也是很嚴重的基層問題，更可能導致嚴重的發展。

(四) 山村治郎：

「人民日報」曾在今年十一月間以「社會民主」爲題，主張加強民主措施，不用高壓手段。其他報刊也曾發表論文，有的擁護鄧小平路線，有的仍以毛思想爲中心，可見中共內部的意見頗爲分歧。此外，在「四化」計畫之下，農業分散的傾向，越來越大；工業向下授權的情況，也越來越明顯，這對中共的獨裁體制，是一種挑戰。今後趨勢，值得注意。

(五) 張京育：

一般說來，一個政權的獲得支持，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爲合法性，也就是透過選民取得政權；二爲有效性，也就是透過選舉，爭取民意的支持。從二者來看，中共的合法性及有效性都面臨着空前的挑戰。中共奉行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現在已使大陸人民產生了「信心危機」。中共迫不得已，祇好退却，但仍堅持共黨領導。大陸知識份子和廣大階層要求民主，中共又祇能以所謂社會主義的民主，進行安撫。大陸人民也像波蘭人民一樣，不會以此爲滿足。三十多年來的事實證明，中共無法改善大陸經濟；最近又將所謂「四化」的目標，不斷調整，不斷縮減，使大陸人民懷疑中共所採的經濟路線是否爲中國經濟問題的確切答案，因而也產生了「信心危機」。此種「信心危機」一天不能解除，中共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便一天無法解決。

（六）李天民：

毛死後，葉劍英對於中共政權領導層的動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華國鋒一九七一年一到北平，就向葉儘量靠近。華當權後，葉也盡了保駕之功。華政權原是一個大聯合陣線，迨鄧小平復出、陳雲彭真等相繼復位後，其複雜性更見增加。此外又有由「四人幫」派倒戈而來的吳德、汪東興等，插足其間，而且具有名位勢力，成爲主要的發酵因素。葉劍英的存在，便是在這一極端複雜的聯合陣線中，擔負起維持平衡、阻止衝突的作用。過去四年以來，鄧小平一派與汪東興等人之間是主要矛盾之所在；華、鄧之間則是既聯合又鬭爭；葉在華鄧之間，較偏於華，但非反鄧。華能依順葉，乃至捧葉，而葉却不能駕馭鄧；鄧祇能爭取葉，而不能抬高葉。這便造成了「三頭馬車」的極其錯綜微妙的關係。過去四年中，中共內部未爆發大分裂，未掀起另一次大鬭爭，主要是由於文革的慘痛教訓，誰也不敢輕舉妄動；其次則是得力於葉和其他老一代回朝人物如陳雲、聶榮臻、徐向前等的居間調停。

毛死後，中共的權力與路線再建。華國鋒不可能揮出大筆，但又不能長期停滯在一灘死水中。鄧小平和他的一派，陸續回朝當權，採取了穩紮穩打策略。鄧的勢力在擴張，領導形勢在升高。他爲原則主張爭，也爲權力地位爭。從一九七八年五屆人大二次會議，華國鋒的政府工作報告，到一九七九年九月卅日，中共建立政權三十周年的葉劍英講話，大體上已是跟隨鄧小平的調子。這並不意味着中共政權領導層已表現了水乳交融的團結現象。到五中全會和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鄧小平再贏得一步一步的勝利。一些有關路線、權力、歷史和批毛的問題，都逐漸明朗乃至接近攤牌階段。但結果是解決了一些問題，又產生了新問題；解開了一些矛盾，又產生了新矛盾。鄧小平權力升高了，還不能說是一手遮天。

五屆人大三次會議，華國鋒辭去總理。這是權力的削弱，不是失勢，因爲他還在人代會上作了政策性的講話。即使他在「十二大」不能保留主席地位，當也不致淪於吳德、汪東興的命運。這時葉劍英却呈現了不正常現象。在鄧派所提「年輕化」的「號召」下，國務院中共年老的副總理與人代會副委員長都辭職了，葉劍英則仍以八十四歲的高齡留任委員長。人代會後，他自己說他請辭未獲同意。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召開之前，他前往廣東、浙江、江蘇、湖北等省視察。軍中另一受重視人物許世友，也在人代三次會後，有一個長時期住在南京。雖然，以後並無風暴，却不能否認有風將興浪將作的跡象。香港「爭鳴」的言論報導，對華有輕微貶抑，沒有重批評；對葉只作了側面疑問，而正面則仍予尊重。可見他仍然居於關鍵地位。他接近華多於接近鄧。他會不會因鄧的聲勢日高，感到不安與不滿，而再與華國鋒等人，組成聯合陣線，以維持今天的局面，並推遲乃至阻止鄧小平時代的出現，則是值得注意的。

當然，瞻望未來，還要看鄧小平的作法所投下的影響。目前，審判「十惡」正在進行。把它視爲中共在製造社會主義法制形

象，乃是只注意到表面。審判「十惡」，的確是空前的。它是中共建立政權以來，整肅反對派最大不同的方式，也是鄧小平掀起的一場大報復，旨在擊倒十年文革中反劉少奇和他的人，毛澤東也包括在內。（只是間接打擊而已）。把林彪與四人幫打在一起，本是由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全軍政工會議中提出的。不管審判起訴書中的罪行有無矛盾，不管被告在受審中的表現各有不同，乃至不管這次審判可能帶來何種後遺症，它為政治服務，是會有一定作用的，它也為中共的權力鬭爭，作了空前的表演。審「十惡」的重要政治任务在此，其餘都是次要的附帶的。

現在盛傳華國鋒可能在「十二大」喪失中共主席地位。這也要看鄧小平如何表演。鄧如真正建立集體領導，不作主席，則華可能保有主席空名，葉也會在下屆人大辭去委員長。倘能如此，中共權力鬭爭將可鬆弛一個時期。如果華在「十二大」被迫、被脅、或被誘下台，而上台的是鄧，則說明鄧過去任何主張與行動，都只是為他爭取主席鋪路，也意味着中共又一次的權力鬭爭停不下來。屆時葉劍英與鄧小平的關係一定會惡化，鄧的命運，將是揚眉吐氣的可能性小，焦頭爛額的可能性大。

葉劍英已屆垂暮之年，他還能在鬭爭的第一線站立多久，是很難逆料的；繼他而起的人物是誰，是值得探索的。

(七) 姚孟軒：

「四人幫」倒後的四年中，中共係在亂中求變，謀求可行的政策路線。華當權時，僅對毛路線作技術上的修改；鄧當權後，始作大幅度的修改。鄧的三中全會路線，在政治、經濟、外交上開放，但執行遭遇重大困難。政治開放，出現了人權運動；經濟開放，造成了失調的現象；對外開放，使大陸人民有所比較，對現狀更為不滿，對中共更為失望。於是中共從去年三月起又開始收緊，經濟開放變為經濟調整；政治及對外活動不能逾越「四個堅持」，但因易放難收，改變路線仍然不能解決各種問題。中共的經濟是「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是一種惡性循環。中共現在的「收」，恐仍難逃「死」的命運。原因是在共產制度之下，沒有兼顧政治與經濟、革命與建設的兩全之道。以此推論，未來中共「十二大」也難對其所面臨的各種問題，找出很好的解決辦法。

(八) 伊達宗義：

「十二大」會期一延再延，越延緩便表示中共內部之權力鬭爭越激烈。「十二大」遲早總要舉行，其結果又將如何？華國鋒會不會由此垮台？鄧小平能否全面勝利、大權在握？今年八月迄今，中共政權的國防部長與石油部門負責人選都尚未決定，可見反鄧力量仍然很大。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能否收緊，都有問題。鄧小平原先主張外行領導內行，現又倒反過來了。專家之領導與共黨權威之建立，兩相矛盾，都將如何加以調處？趙紫陽之最大弱點為對軍方之影響力不大。趙以鄧之「黨政分離」路

主，頗遭中共內部尤其軍方反對；削減軍費並使工業轉向民間，軍方反對尤烈。鄧將如何控制軍方？這些都是鄧所面臨之嚴重問題。

(九) 張鎮邦：

剛才郭副主任提到華國鋒下台的問題，本人認爲很有可能。至於由誰來接任「黨主席」職位，現有兩種猜測。一般新聞報導謂將由胡耀邦接替，也有人說可能是鄧小平。此外似無適當人選。由胡接任，符合所謂「幹部年輕化」原則，但不合其他條件；由鄧接任，雖不符合「年輕化」條件，但可能性較大，理由有四：第一，就中共對外關係來說，鄧之國際聲望較胡爲高，其他國家自然希望跟鄧打交道；第二，從毛開始，「黨主席」一直是中共的領導核心，英國報刊即認鄧爲目前中共的領導核心。鄧如不當「主席」，固可表示他無意追求權力；但胡當「主席」後，縱能聽命於鄧，仍難免有「名不正則言不順」之現象發生。唯有由鄧自己出任斯職，才能解決此一「名實不符」之問題。第三，「四人幫」倒後，華不讓鄧復出，當時大陸一般人民對鄧印象不錯，期望亦高；中共多數幹部亦望鄧再出，爲其解除困難。第四，胡資歷不深，威望不夠，目前在黨內具備同樣資歷之高級幹部，仍不乏人。胡如接任「黨主席」，恐將引起爭奪。鄧如出任此職，則可延緩第二代幹部間之矛盾鬭爭，對中共有利。

(十) 主席結論：

聽了各位對中共黨政問題所發表之高見，再回顧過去三年來中共內部權力鬭爭之經過以及政經路線改變的情形，本人想提出兩點看法：第一，關於今後中共高層領導的體制問題，鄧在過去既已不能容忍「三頭馬車」，今後自亦不會接受鄧葉之雙線領導，因此本人認爲鄧將作各種安排，以圖獨攬全權。第二，今後之鄧葉鬭爭或鄧與其他集團間之鬭爭，將決定於新的反對勢力之能否形成？鄧之打擊面如果擴及基層，新的反對勢力也隨之而增大。今後鄧在經濟或其他方面如無突破性之表現，特別是在人民生活方面，如果不能有所改善，則更將加速反對勢力之形成。

第二單元：中共經濟問題

(一) 陳雨晨：中共經濟的堅持與改革

中共的經濟，在生產誘因盡失，勞動意願全無的情況下，承受着九億人民無比的壓力，正作大幅度的改革。這次轉變，對中國大陸人民經濟生活和整個上層建築，將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面臨着一個歷史的轉捩點。雖然目前仍處於摸索試驗的階段，但已

引起內部的歧見和外界的關注！

1. 改革的背景——五十年代，中共繼承俄式經濟管理體制，實行垂直行政領導，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大躍進」時期，經濟政策完全背離經濟規律，以政治口號控制經濟發展；「文革」十一年，極左經濟政策使經濟管理官僚化，經濟結構僵硬，整個經濟瀕臨崩潰邊緣；華國鋒當政後，對遭受近卅年的摧殘又估計不足，提出大而無當的十年經濟規劃，急躁冒進，又完全背離實際狀況。實踐證明，卅年來中共沒有解決中國大陸經濟體制的問題，其根源始自缺乏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和理性的經濟政策。今天中國大陸經濟問題，已非中共主觀意志所能絕對掌握，非改革不足以「救亡圖存」。

2. 改革的方向——目前改革方向尚未定案，但基本上正在就「經濟體制」和「經濟管理體制」兩部份，作廣泛的嘗試。就經濟體制改革部份言，在分配方面想要兼顧個人物質利益和企業利潤，以提高生產誘因和工作意願；在流通方面，則想發揮市場經濟，挖掘生產力，改善供需狀況。就經濟管理體制改革部份言，所涉範圍相當廣泛，可以歸納為十項：(1) 經濟管理和行政管理分開（上至中央有關經濟部門，下至人民公社）；(2) 運用經濟手段和經濟辦法來管理經濟；(3) 將西方市場原理注入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4) 在一定範圍內擴大企業自主權；(5) 實行各種形式的經濟聯合；(6) 展開一定程度的競爭；(7) 有限度開放個體經濟；(8) 利用銀行、稅收、物價控制經濟活動；(9) 加強經濟立法與監督；(10) 恢復十大城市商業貿易中心。總而言之，所有變革都集中於刺激生產的方法和手段。

3. 改革的特性——改革方案並非獨創，而是揚棄、恢復、容納、模仿兼而有之的混合體。中共意圖塑造一個經濟模式，即所謂「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其要點為：(1) 擺脫俄式中央集權的計畫經濟（恢復若干劉少奇的經濟政策），(2) 吸取東歐各國市場經濟的經驗（自負盈虧、自由市場等政策），(3) 引進美國企業管理理論、制度和方法（重視消費，營利為先，競爭第一），(4) 仿效日本戰後恢復與發展之經驗（民主化、科學化、合理化的改革），(5) 學習中華民國臺灣省經濟成功經驗（適合中國社會結構的現代化途徑）。現在中共「混合經濟」體制已略見雛形，是多層次的經濟結構，是矛盾的統一體。今後中共經濟的發展，將進入一個複雜和多元的階段，也將不可避免地經歷長期的、反覆的、曲折的摸索道路。

4. 堅持與改革——中共深恐改革結果，無法有效駕御，陷入混亂，危及政權，故在改革中，有所堅持，也有所改變。所謂「堅持」，就是要(1) 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在「公有制，按勞分配，計畫指導」三原則下，一切有利於生產力發展之各國經驗、制度、方法、措施，均可接受採用。(2) 堅持在「四個原則」下，開展解放思想，放寬政策，和活躍經濟及(3) 堅持量力而行的經濟指導思想，設想放慢，建設收縮。所謂「改變」則是要(1) 改變以階級鬥爭為綱，為以生產力發展為中心的經濟思想。(2) 改變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窮過渡和平均主義。(3) 改變不合人民物質需要的生產目的。堅持在防變質，改變旨在救窮。以遷就人性來提高生產積極性，以容忍來換取經濟活躍，以放寬來救治困窮，以開放來滿足個人慾望。但所有的遷就、開放、容忍、放寬都將被限制線為

在「一定限度」之內，也只維持在「一定時間」之內，不再反覆。

5. 基本的矛盾——中共的經濟改革中存在着難以克服的重大矛盾。第一是經濟政策中的「四原則」與「四開放」間的矛盾；一面要求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一面又要求解放思想；放寬政策，敢於探索，大膽創新。第二是經濟活動中的「三統」和「三多」之間的矛盾：一面加強統一計畫，統一政策，統一指揮；一面要求多種經營形式，多種勞動組織，多種計酬辦法以及多成份、多方式、多層次的經濟活動。這種相互矛盾的政策，充份顯示中共「放」「收」之間的困境，其所造成的進退失據，將使經濟無法步上正常發展的軌道，作澈底的改革。

6. 面臨的問題——(1)理論方面：新的改革孕育着相當的資本主義成份，引起思想理論與現實做法間的嚴重矛盾。理論無法聯繫實現，已使沿襲多時之思想理論趨於腐蝕和破滅。現在舊的制度正在打破，新的理論尚未建立，處於混亂、摸索、半真空狀態。政策開放和競爭觀念的引用，引起了社會價值觀的改變。凡資本主義社會所有弊病，均已相繼湧現於中國大陸，且將隨着政策推展而擴大，潛伏着種種「亂」的根源。(2)現實方面：新的經濟改革有助於救活瀕於崩潰邊緣的中共經濟，但「徒法不能自行」，問題是必須有一定水準的執行幹部，改革才能落實。中共三千八百萬黨員和幹部，現代化知識不足，思想凝固，執行改革，當是障礙；況且官僚政治盛行，封建遺毒過深。上層存在「明無山頭暗有礁」的隱患，中間階層為保全既得利益，陽奉陰違，拖延阻撓；下級幹部心存戒懼，裹足不前。中共經濟調整改革以來，已完全暴露它的困難與弱點。

7. 前景展望——改革結果可能危及中共政權的安全及其領導者的權位，改革影響也將深深觸到思想意識。「收」則改革無法澈底，無濟於事；「放」則人民思想自求解放，危及政權，結果是經濟上的不安定和政治上的冒險性。因之，經濟改革將成爲中共「十二大」經濟路線鬭爭之焦點。諸如個體所有制問題，允許資本主義經濟成份存在問題，經濟體制改革走向問題，新十年經濟規劃速度問題等等，都是爭論的主題。展望未來中共經濟改革的適應環境是分歧和紊亂，而不是調和與安定，八十年代中共經濟是在一邊走，一邊摸索，在緩慢成長中黯淡過去！

(二) 廣瀨一：

1. 中共經濟的體制，有人說是模仿南斯拉夫，有人說是在學匈牙利，也有人說是要建立它自己的發展模式。這倒可以表示出中共經濟路線之搖擺不定，莫衷一是。這也可能是中共經濟不能發展的原因之一。2. 中共在改革經濟之前，必須先解決人口、人才、科技及能源等問題，其中尤以人口及人才問題爲重要。中國大陸的人口問題，至爲嚴重，盡人皆知，毋庸多講；而人才之缺乏則將是中共「四化」的主要阻礙。據專家估計，目前中共勞工及職員的教育水準很低，其中百分七十至八十，未達初中程度。中共把勞工分爲八級，三級以下者佔三分之二，而略有技術者又僅佔其中的百分之三。中共派往日本受訓的人員大多只有小學三

年級的程度，簡直無法加以訓練。不久前渤海鑽油臺倒塌，引起了大風波。據日籍顧問透露，中共工作人員曾在臺上養豬，且不聽日籍顧問的勸阻。足見此等工作人員的知識低落，觀念大有問題。3. 面對中共的經濟情勢，日本工商界對中國大陸市場之嚮往，已趨冷靜，重新檢討，並已開始退却。尤其是最近以來，中共跟日方合作的許多建設計劃，如非延期，便是停頓，更使參加合作的日方陷於進退兩難之中。

(三) 清水亮：

中共之經濟仍在暗中摸索，名爲「調整」，實爲「混亂」，尚未找到它自己的道路。寶山鋼廠事件便是一個實例。此廠原由日本有關商社與中共合作興建，但因中共計劃和估計都有錯誤，以致問題重重。且中共工程人員的技術程度過低，建廠過程拖延很長，引起增資的需要，而中共又無資可增，以致整個建廠工程停頓下來。但中共不自反省，反而責怪日方。這些現象都使日本的大小企業界深感困惑。又如中共之石油減產，其對日本之供應量，與中（共）日長期貿易協定所定的數量，相差甚遠，也使日方喪失了對中共的信用和信賴。至於中共內部的權力鬭爭，政治動亂，人事變化，對於日本與中共的關係，亦有不良影響。日方深知唯有在中華民國才能找到安定的市場和投資環境，所以日本商社今後必將加強對臺灣的貿易、投資以及技術合作。

近有日人隨團赴中國大陸訪問，曾親見其中共所派年輕導遊向路邊攤子買太陽眼鏡時，不買大陸產品而買臺灣產品，原因是前者之鏡片爲黑色，只適於盲人使用；後者之鏡片有深有淺，正合需要。此雖小事，但亦可概見臺灣產品之受到歡迎。

(四) 陳定中：

今（一九八〇）年十月下旬中共「國務院」召開「全國財政會議」。據姚依林在會中透露：(1) 今年的財政赤字原預計爲八十億人民幣，實際將達一二〇億。(2) 八一年石油產量將較上年減少四百萬至六百萬桶；將較原定目標減少兩千萬桶。(3) 八一年基本建設投資將由五五〇億減爲四五〇億。(4) 八〇年糧食減產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噸。此外，中共經濟中之農業困難，最爲嚴重。目前農業生產水準較一九五七年爲低。植物油產量降低百分之四十三點二。棉布減產百分之五點七。百分之二十七點三的生產隊平均每人每年收入不到五十元人民幣（約合三二美元），難求溫飽的農民高達一億數千萬之衆。八〇年中共進口糧食達一千六百萬噸。總之，毛死後，中共經濟未有好轉；華當權後，更多經濟失誤。此種困局仍可能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五) 陳雨晨：

今年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發出緊急通知，全面緊縮基本建設，其要點爲(1)自十二月一日起，今年的基本建設預算，不得追加

；(2)原計劃興建之辦公大樓、招待所、旅館等一律停工待檢，各級銀行不得撥款；(3)所有建設單位不得增加員工，已經錄取之工人暫不到差進廠；4.原材料工業有污染者停止建廠。這些都可顯示中共財政的極度困難；寶山鋼廠工程之停頓便是在此種情況下產生的，值得日本方面參考。

(六)尹慶耀：

每一個共產國家都會進行過經濟改革，其中較有成效者首推匈牙利，但也仍有許多毛病：(1)投資無法控制，導致中央減少，地方增加；或預算以內之投資減少，預算以外之投資增加，因而發生重複建設或盲目建設的流弊。(2)各業各廠的利潤有多有少，員工待遇不平，產生貧富差距。(3)通貨膨脹，物價高漲，迫使政府動用預算經費加以補貼，不勝負荷。中共經濟仿效匈牙利，上述毛病亦必隨之而來。中共的經濟基礎不如匈牙利的堅實，可能發生的毛病自會更多。是以中共之經濟改革，前途絕不樂觀。

(七)陳定中：中國的農業問題

中共建立政權三十年來，雖然達成對農民的嚴密控制，但在農業生產方面却交了白卷，甚至得了負數。長期以來，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組織，已經變成一個「均貧」「共慘」的爛攤子（中共自供是「一拉平、一起窮」的社會主義）。據中共指出：現在大陸有二七·三%的生產隊，每人每年收入不到五十元人民幣（不到三十二美元），許多地區的農民連起碼的溫飽生活都無法解決，農村經常有一億幾千萬人口因口糧不足受到饑餓的威脅。中共最近又承認一九八〇年的糧食產量減少了一千五百萬噸至兩千萬噸，顯示糧食缺乏所造成的困難問題，將更嚴重。

自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強農業和放寬農村經濟政策之後，中共即一方面增加對農業的投資，一方面採用物質刺激的辦法，提高農民的生產情緒，希望透過以上兩個步驟，來挽救大陸農業停滯落後的惡劣局面。

在增加農業投資方面，近兩年來中共農業投資在基本建設投資中所佔的比重，雖然從過去所佔的一〇·七%提高為一四%，但投資的絕對數字仍少得可憐。一九七九年中共支援人民公社和農業事業費，只有九十億一千萬人民幣，比文教衛生費的支出還少，而且一九八〇年由於財政赤字無法平衡，又把農業事業費減少為七十七億四千萬人民幣。這說明在財政支絀的情形下，增加農業投資已難以為繼。所以中共現在轉而把希望寄託在激勵農民的積極性上面。

在刺激農民生產情緒方面，近年來中共所採取的措施主要有：(1)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2)擴大自留地，(3)開放農村集市貿易，(4)放寬家庭副業的限制，(5)推行各種生產責任制。這一連串措施雖然起了刺激生產的作用，但仍無法根本扭轉農業的劣勢。所以，最近中共乃轉而在大陸全面推行「分田到戶，包產到人」的生產責任制，把它作為「解決溫飽問題」和「治窮」的急救措

施。

所謂「包產到戶」和「包幹到人」，就是把原來屬於集體耕作的土地，分散包給一家一戶去耕種。另外不屬於耕種的農活，如飼養、採集、加工等副業，則包給每一個有技術的農民去經營。承包的農戶或個人，只要在一年之內，向中共繳納若干地租或實物，由人民公社生產隊分別與農民簽訂生產合同，照合同的規定交租，多餘的產品由農民獨得，完不成合同時則要農民賠償。這一套辦法原是五十年代農業合作化時期的產物，人民公社化後即不斷受到批判與揚棄。現在因為集體經濟失敗，再度把它拿出來使用，因而立刻在農村造成思想混亂，產生各式各樣的傾向，具體的情形是：

1. 大陸農村幹部多數都對「包產到戶」抱抵制態度，因為過去的集體耕作由共幹控制指揮，他們可以化公為私，上下其手。現在分散到一家一戶去耕種，共幹變得無事可做，也失去了多佔多吃的特權，所以他們反對包產到戶。

2. 中共的軍隊也反對包產到戶，因為他們在部隊服役，家中缺乏勞力，不能多包耕地，認為包產到戶嚴重損害到他們的利益。

3. 原來農村中的「五保戶」和「烈屬」「軍屬」，他們缺乏精壯勞力，也不贊成包產到戶。

以上反對包產到戶的人，指責包產到戶和包幹到人的政策，背離了社會主義道路，本質上是倒退的單幹，是方向性的錯誤。

4. 家庭人口較多的農戶和有技術的農民，則歡迎包產到戶，因為他們多勞可以多得，幹勁隨之增大。所以凡是推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生產都能獲得進展，農民吃穿的問題也能逐漸得到解決。這也是中共推行包產到戶的重要原因之一。

5. 另外還有兩種傾向，一是鑒於過去包產到戶曾被嚴厲批判過，把「包」字視同瘟疫，採取迴避觀望的態度，另一種是不相信包產到戶是持久的政策，所以有些地方農民分到山林之後，一下子連小樹都把它砍光，造成嚴重的損害。

中共現在對包產到戶是肯定多於批判，承認包產到戶有「四大好處」和「十大不利」，在宣傳上則肯定利多於弊，但却很難自圓其說。十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廣播電臺的評論就指出：「實行包產到戶是治窮的一個辦法，不是資本主義，並不可怕，包產到戶只是一定條件下的特殊措施，它解決不了中國農業的根本問題，農業要發展，主要還是要靠走集體經濟的道路。」這等於說，包產到戶只是一項救急的權宜措施，過了一段時間還是要回到集體的道路上，這也說明包產到戶祇是緩和中共與農民之間的緊張關係的一種新租佃關係。使中共取代了過去的地主的地位，大陸農民則成爲紅色政權下的「佃戶」和「長工」。

中共不能經由包產到戶逐步打開農業生產停滯的局面，這要取決於兩個條件。第一是要看中共能否把抵制包產到戶的勢力壓下去。第二是要看中共對農民追求個人生產的傾向容忍到什麼程度。如果中共能順利地推行包產到戶，讓農民獲得較多的個人生產，那麼大陸農村窮困的現狀將可逐步改變。反之便不可能有多大的經濟效果。如果中共能容忍較多的個人生產的發展，那麼農民嚐到甜頭之後，將會有更多的要求，個體經濟也將對集體經濟產生更多不利的瓦解作用，新的紛擾仍將無法避免。

中共被迫恢復包產到戶，最少反映出以下三項事實：

1. 反映出二十幾年來集體經濟的失敗，揭穿了所謂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謊話。
 2. 反映出「農業現代化」將被暫時擱置，因為在包產到戶的基礎上，大規模的農業建設已不可能進行。
 3. 反映出中共在處理農業問題方面的技窮計拙，說明中共挽救農業的措施，仍然沒有繞出原來走不通的死胡同。
- 以上情況，顯示大陸農業問題，還不是短期之內所能根本解決的。正如中共所說，包產到戶是解決不了農業問題的。中共只有放棄集體經濟的桎梏，大陸農業才有出路可言。

(八) 張鎮邦：

「十二大」之延期召開與經濟情況亦有關係。華國鋒原有十年經濟規劃，因大而無當，不切實際，已予放棄。嗣又提出經濟調整，並經三中全會決定，旨在縮小規模。現因財政困難，再予縮小。至於未來十年究應縮小至何程度，迄未決定。假設明年五月召開「十二大」，距今只有半年。中共在此半年內能否搞出一個切實可行的經濟計劃，仍值懷疑。這或許也是延展「十二大」召開時間的原因之一。

(九) 桑原壽二：

四個現代化原為中共內部的不同派系所同意，只是在程度上互有差異。有的主張充份發展市場經濟和個體經濟，有的則表反對。毛思想派和實務派的目標相同，但意見對立。按照常識判斷，現代化本是很好的，但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便會產生問題。中共希望堅持本身原有的經濟體制，同時摘取可用可行的資本主義經濟措施，而成爲一種混合體制。能否成功，仍是疑問。因此，中共能否在今後十年八年內解決經濟問題，本人仍是十分悲觀。就當今各開發中國家的現代化而言，中華民國和大韓民國都很成功，伊朗則已失敗。將來中共之成敗如何，自然值得注意。中華民國現代化的成功，主要應歸功於教育的成功；伊朗的失敗，則應歸咎於柯梅尼。在中共現代化過程中，也可能會有第二個柯梅尼出現！

(十) 高田富佐雄：

中共要實現「四化」，很難成功，主要是因爲權力鬭爭加速擴大，人民對中共失去了信心。本人在日本講演時，常有聽眾問我：中共能控制大陸多久？並且說：俄共控制蘇聯已有七十年，中共會不會如此長久？我說中國人與俄國人不同，中共的控制恐怕也難如俄共的長久。記得前年四月在東京舉行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時，郭華倫教授曾經預測華國鋒政權的壽命，只有

三年。如今華已搖搖欲墜，正好應了郭教授的預言。中共的壽命究有多久？希望郭教授再作預測，或由我們來共同推算！

第三單元：中共的對外關係

(一) 尹慶耀：中共與蘇聯關係蠱測

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同蘇聯與西方的關係，是互相激盪的。蘇聯與西方的關係，當前十分冷淡，但並非是一成不變。

就蘇聯說：1. 西方立場堅定，實力堅強，即改採謹慎緩進政策，是共黨的慣技；2. 阿富汗問題尚未解決，東歐局勢又有不穩，蘇聯經濟亦有困難，不宜對外冒險；3. 一九八一年二月蘇共第廿六次大會時，人事或有異動，但布里茲涅夫未有引退跡象，對外仍將強調緩和外交，以謀打破其在國際間的孤立處境；4. 蘇聯對中共之包圍網既經完成，緩和與美國、日本、西歐的緊張關係，可間接減低中共牌的身價。

世界局勢雖極緊張，局部戰爭仍在繼續，但全面核戰仍為各方面所竭力避免。美蘇似均有恢復談判意願。我們承認東西關係改善決非短期內可以實現，八十年代上半可能是談判與對抗並肩而行。但美蘇關係未來發展，則充滿變數。

中共與蘇聯的關係，目前已十分惡化。在東西關係未改善前，中共牌仍將被西方利用。中共牌是政治牌而非軍事牌，但有刺激蘇聯加強軍備的作用。就事實說，任何國家均無力援助中共到足可與蘇聯對抗的程度，中共也決不會為其他國家火中取栗。所謂平行的戰略利益等等，其政治意義實大過軍事意義。一俟東西緊張緩和、中共虛弱實情暴露，則中共牌必將貶值，中共反蘇急先鋒姿態亦難長久維持。

中共內部鬭爭激烈，鄧小平路線未獲全面支持，現代化工作受阻，管理體制改革難以收效，經濟調整工作勢須再予延長。八十年代前半，中共政治難以安定，經濟難望好轉，而屆時鄧小平已年逾八旬，其現行路線乃至其本人的政治活動能否繼續，順利推行，是一個未知數。

蘇聯對中共僅係以戰迫和，中國大陸難於一夜征服，蘇聯對中共用兵，並無有利的戰略目標，反易在自由與共產世界引起不利反響。加重壓力、縮小包圍圈，以待中共屈服，對蘇聯較為有利。

以反蘇姿態博取西方援助，為蘇聯摘掉修正主義帽子以保持「規定距離」，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中共十二大如何維持此種「走鋼索」式的對外政策，將是所面臨的一項難題。

結論：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將來和、戰、拖均有可能。如無未經預料的突變發生，則當以第一項可能性最大，第二項最小；

八十年代前半，可能是拖的局面，後半則極可能有限度緩和。這是玩中共牌應有的考慮。

(二) 伊達宗義：

1. 中共與蘇聯關係的緩和或改善，對國際局勢將有影響；而國際局勢的改變，對中共與蘇聯間的關係，也有影響。因此關於中共與蘇聯的關係，應注意其本身的變化，也應注意國際情勢的變化。2. 中共與蘇聯雖然處於尖銳對立，但彼此之間，有相異之處，也有相同之處，研究兩者的關係，應特別注意其性質相同的方面。3. 中共的「四化」對其與蘇聯的關係，亦有影響。現在中共的「四化」為西方方式，可能拉遠中共與蘇聯間的距離。但是中共各方面都很落後，不易學西方，故也可能轉而再學蘇聯。有人說：中共過去的五年經濟計劃，採取蘇聯模式，時間短，收效快；現在的經濟計劃則相反。暗示採西方模式無甚好處。據說目前中國大陸產品中的百分之七十，都是由以前的蘇聯工廠製造出來的，如果要把這些舊廠更新為西方式的工廠，顯至困難。因此，中共的現代化仍有捨西方而就蘇聯的可能。4. 雙方領導人的更換對中共與蘇聯的關係，也有影響。鄧小平當權之後，中共與蘇聯和好的可能性，恐會加大。

(三) 笠原正明：

1. 蘇聯的對外政策可能針對西方的弱點，繼續維持其侵略性，也可能由於其內部危機和外來壓力而改採較溫和的態勢。請問尹教授的看法如何？又蘇對波蘭危機可能採取何種解決途徑？2. 中共的對外政策原以三個世界論為基礎，但以後的發展顯示，中共並不重視第三世界而想拉攏西方。今後中共不可能建立新的外交路線？其性質又將如何？

(四) 尹慶耀：

1. 中共與蘇聯關係的演變，在八〇年代前半段，可能是「拖」，在八〇年代後半段，可能是「和」。此一判斷係根據下面幾個因素：第一西方玩「中共牌」的興趣，到八〇年代後期可能會降低；第二雙方領導階層到八〇年代後期都可能會有權力轉移；第三中共經濟學西方，隨之而來的各種毛病，會在八〇年代後期出現，屆時可能回頭再學蘇聯。

2. 布里茲涅夫的外交重點，在於美蘇和解，維持共存；增強軍力旨在免受美國威脅；對於第三世界的解放運動，莫斯科將透過代理戰爭的方式，予以支援。至於目前波蘭危機，影響太大，蘇聯在波共不能控制局勢時，可能干預。現正調集重兵，作出姿態，期能迫使自由工會屈服，非到萬不得已，不致出兵。

3. 中共不會放棄第三世界，只是它在八〇年代的外交重心，在於拉攏第一世界的美國和第二世界的西歐及日本，俾便對付蘇

聯。當前中共的作法，是想從西方得到可能得到的利益，藉以充實力量，提高它與蘇聯談判的地位。中共已經替蘇聯摘掉了「修正主義」的帽子，旨在免除雙方的原則之爭。「十二大」之後，中共仍將維持反霸統戰，並以反蘇急先鋒自居，以便爭取西方的援助。但是，爲蘇聯摘掉「霸權主義」的帽子，比摘掉「修正主義」的帽子更容易，只要蘇聯態度稍微軟化，中共就可能跟蘇言和，惟雙方關係不會恢復到五〇年代之親密。

(五) 福永安祥：

蘇聯的外交策略是要乘虛蹈隙，擴張勢力，在不與美國發生直接衝突的地方，便會使用武力，阿富汗事件便是例證。不過，雷根就任美國總統後，將對蘇採強硬態度，美蘇之對立可能越來越尖銳化。其次，蘇聯經濟在一九八三以後會逐漸衰退，而美國的經濟情勢可能因雷根之當政而好轉強化。因此蘇聯也可能利用目前的有利時期，加緊向外擴張。屆時美、蘇、中共間的三角關係，究將如何演變，深值注意。

(六) 張鎮邦：

1. 中共不會因爲「四化」障礙而重新學蘇聯，因爲蘇對中共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僅曾貸予三億美元，如果是西方，可能更慷慨；其次是蘇俄的技術並不優於西方，而且貸款條件苛刻，又要干涉內政。2. 蘇聯現行外交不是「緩和」外交，「緩和」只是口號，只在國際局勢緊張時拿出來談談，以便鬆懈西方的警戒心理。因此，布里茲涅夫不會放棄擴張政策，也不會變成和平使者。3. 中共的第三世界論已經起了變化。中共以前強調戰爭不可避免，說共產革命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又說什麼「天下大亂，情勢大好」，儼然是一付造反模樣。現在中共却不彈這些舊調了；相反地，它說要擁護世界和平，胡耀邦最近甚至說戰爭是可以避免的。不過這些話和以前的理論一樣，都是謊言，不可相信。

(七) 姚孟軒：中共對美國的統戰外交

兩年以前，中共改變對美國的政策，實行聯美反蘇。鄧小平說：這一改變基於長期的戰略考量，不是權宜之計。七十年代中期，毛澤東策定的「國家戰略」長程目標，是經由在本世紀內完成四個現代化、促進國際力量敵消我長的有利轉化，使中共成爲另一共產強權，扭轉在世界權力結構的劣勢地位。今年年初，鄧小平根據這個戰略目標，又確定以爲四化奠定堅實基礎、反霸（反蘇）、「統一」臺灣，作爲八十年代的三項主要任務；而無論是要實現上述長程目標或中程目標，都有賴美國的援助。黃華在一次秘密外交報告中說：八十年代的三大要務，需要借助於進一步打開北平與華盛頓關係的大門來達成。但黃華又說：美國仍然

是資產階級國家，認識它對反霸及「四化」的積極作用與重要地位，跟認識它的國家性質是不同的兩件事；在西方國家搞暴力革命，現在還沒有具備條件。這已表明北平雖是着眼於長程戰略利益而聯美，却未放棄反美的基本立場。變的只是：將美國由今天的敵人，變為明天的敵人，變為今天的暫時的同盟軍，與之維持類似抗戰時期它跟國民政府間的亦敵亦友關係，同華盛頓建立類似當年抗日聯盟的反蘇聯盟。黃華形容這種關係是「一項沒有先例的國家對外關係」，說這不是對抗，也不是不親不疏，而是跟對手親近，相機謀取厚利。因之，他說，就對美外交而言，八十年代是「騎紙老虎的時代」。

這是將統一戰線以敵制敵的借力策略應用於對美外交。中共的聯美，是統戰式的，「求大同，存大異」，即將意識形態、國家目標、社會制度的「大異」暫時擱置一邊，找尋現實利害的共同點，並運用這些共同點作為接觸的媒介與聯合的基礎，北平主要從兩方面向美國求同：1. 以反蘇急先鋒的姿態投白宮之所好，並將反蘇與其戰略利益連接起來，強調沒有強大的中共，就不可能有與蘇聯抗衡的優勢，因而美國應援助北平，使有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從事四化建設、有能力承擔反蘇責任的國防力量。美國今天以先進技術支援中共，明天中共也會反過來維護美國的利益。2. 以開放大陸市場引誘美國，讓山姆大叔覺得同中共交往有利可圖。

中共循求同的途徑，塑造對美外交的新形象，已得到很多好處。姬鵬飛透露，布里辛斯基一九七八年五月訪問北平，為中共說詞所動，想到建交的「迫切需要」。在關係正常化以後，雙方又建立經濟、科學技術與軍事合作，簽訂了一系列有關協定；貿易額一九七九年增至廿三億美元，八〇年又增至四十億，八五年可能達一百億。雙方並商定在戰略上採取平行行動，共同對付蘇聯。香港一家替中共發言的報紙，把這種平行行動說成事實上在搞聯盟。然而，華盛頓雖視北平為反蘇夥伴，但對這個夥伴仍有顧慮，更不願為支援北平而過份激怒莫斯科，因而對處理與中共的合作，相當謹慎而有節制，未能滿足中共的需求，中共對此已有怨言。更重要的是，北平與華盛頓為反蘇而結合，惟反蘇的目的却不一致。北平企圖加劇美蘇矛盾，挑撥兩強緊張對抗，將所受蘇聯的壓力，轉移給美國和西方世界，並使白宮更加重視它在反蘇鬭爭中的地位與作用，以乘機謀取厚利，故而一直鼓動美國與蘇聯進行針鋒相對的鬭爭。華盛頓的意圖，則在遏阻莫斯科對外擴張，維持權力均勢及世界現狀，兩者間有很大差距。中共無力影響美國的政策，如果跟着華盛頓走，不僅它的製造美蘇對立從中取利的計謀將完全落空，更可能弄巧成拙，招致無窮後患。

中共更擔心雷根入主白宮後，華盛頓的政策可能有對其不利的變化，美國大選揭曉以前，北平攻擊雷根改善與中華民國關係的主張，雷根當選總統後，又對這位白宮新主人大送秋波，聲言願在全球性對抗蘇聯侵略上與之合作，並歡迎雷根往訪北平；不久前，復為雷根外交顧問克萊恩的坦率言論大肆咆哮，指克氏所言中共應恢復文明行為的典範，宣佈不以武力侵犯臺灣，對外開放等，為大膽干涉其內政及蓄意挑釁，美國如果與中華民國恢復官方關係，將有「嚴重後果」，甚至暗示將玩蘇聯牌，對美國報復。實則雷根政府的對華政策不致根本改變，中共渴求華盛頓援助極為殷切，也不會為所謂臺灣問題輕易與美國翻臉。不過，卡

特政府對北平政權的穩定性、北平與莫斯科分裂的利用價值皆估計過高，因而視中共爲一張王牌。克萊恩的言論却顯示，雷根的外交智囊對此將重作評價。克氏並認爲，中共牌只是一張小牌。其次，卡特時代美蘇間的新冷戰狀態，乃因其對蘇政策的軟弱與搖擺不定，以及熱中於玩弄中共牌所造成。雷根將改採圍堵而不對抗的政策，以堅強實力及堅定立場與莫斯科談判，將可能使美蘇關係復趨穩定。果真如此，美國將重建與北平、莫斯科間的等距關係，中共牌的價值也將隨之減低，自不必再過於遷就中共。

莫斯科的態度，對北平對美統戰外交也有影響。中共現行政策是一面聯美反蘇，一面以低姿態穩住蘇聯，維持已持續廿年之久的不戰不和狀態。可是，莫斯科過去願意保持這種狀態，是因爲中共又亂又窮又反美，對其安全毫無威脅。但現在不同，北平聯美反蘇使蘇聯東西兩面受敵，北平依賴美國及西方的援助建設四化，又使其東邊將有個親西方的強鄰，這都不是它所能忍受的。蘇聯已與越南結盟，對中共形成南北夾擊，它不會讓目前的局面再長期拖下去，如何穩住這個強敵，也是北平在外交上面臨的難題。

(八) 沈劍虹：

中共「十二大」會期雖尙未定，大概總在明春。目前世界基本形勢爲美蘇抗衡，中共內部局勢對此並無太大影響。「美匪建交」之後，中共處境好轉，但各方威脅依然存在。從中共立場看，蘇俄對其構成致命之威脅，故中共先反美蘇兩霸，後以反蘇爲主。不過，蘇俄稱霸是全球性的，中共反霸却是區域性的。中共不能反共，因它也是共產政權；它也不能反俄，因彼此爲鄰；所以只能反霸。

蘇俄在東北亞稱霸，從二次大戰後便已開始，外蒙獨立與韓戰爆發，都是例證。越戰結束，印支三邦赤化，越南倒向蘇俄，金蘭灣成爲蘇俄軍港。這些都可顯示蘇俄在東南亞的霸權，已經建立起來。蘇俄入侵阿富汗之前，中共只受到南北兩面的夾擊；阿富汗事件之後，中共已陷入了三面包圍之中。故中共要拉攏美國、西歐和日本，制衡蘇俄，減輕威脅。

然而中共的聯美制俄，只是中國歷史上「以夷制夷」之老套，並無新奇之處，也並不表示要與俄一戰，因中共不但無此意願，而且無此力量。中共所希望者，乃在藉此爭取西方（包括日本）之科技資金及其他援助，以便充實國力，加強其與蘇俄談判之地位。同時也希望利用美蘇兩國間之矛盾衝突，而坐收漁利。中共的最終目標，是要達成與美蘇鼎足而三之局面。在此一目標之下，臺灣的重要性不可忽視。中共想要造成鼎足之勢，必須拿到臺灣。臺灣戰略地位重要，可以切斷從海蔘威至金蘭灣之航線，對蘇俄海軍在太平洋之活動，深具威脅。故中共倘能佔領臺灣，便可利用有利情勢，與俄蘇進行和解。

中共一向視東南亞爲其勢力所及之地區，其在東南亞反對蘇俄稱霸之統戰，仍將繼續進行。今後四年雷根政府重振美國軍威之程度，將是東南亞局勢演變之重要關鍵。如果美國及其有關盟邦加強軍力，採取共同行動，對於東南亞的局勢將發生決定性的

第四單元：對「林、江集團」受審的觀察

(一) 桑原壽二：

中共的所謂「十惡大審」是一場政治性與戲劇性的表演。中共想用對「林、江集團」的審判，來了結它三十年來所犯的過錯，今天我們也要以對「林、江集團」受審的觀察，來結束這一次的中日學者會議。

本人認為，這次審判再一次證明了中共內部是一個充滿了「冤冤相報」的世界，毛澤東遺留給中共的最大影響，便是「仇恨」和「報復」。中共今後將進入一個永無休止的仇恨與報復的惡性循環之中，這一次的審判只是一個開始而已！

(二) 張統立：中共對「江、林集團」的審判

中共於今（一九八〇）年九月廿七日對外宣佈將定期公開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十名主犯；十一月十日，中共的所謂「特別檢察廳」正式提出長達兩萬多字的「起訴書」；十一月廿日，由中共「最高人民法院」所組成的「特別審判庭」開始正式審判，現仍在進行中。所謂十名主犯，依次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另有林彪、康生、謝富治、葉羣、林立果、周宇馳等六名主犯，因已死去，不再追究。「起訴書」中也提到其他六十名人犯，將另行處理。

「起訴書」列舉「林、江集團」四大罪狀，八大罪名，四十八條罪行，以「顛覆政府分裂國家罪，武裝叛亂罪，反革命殺人、傷人罪，反革命誣告陷害罪，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刑訊逼供罪，非法拘禁罪」，提起公訴，但未指明何人觸犯何條何款「刑法」。

此次中共所謂的「十惡大審」，實際上是以鄧小平為首的復辟派所導演的一場政治鬧劇。其目的有五：

1. 否定「文革」，肯定「劉鄧路線」——毛搞「文革」鬭爭，主要目的是批判劉少奇、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鬭爭劉鄧集團，推行極左的毛路線，也有意藉此整頓老朽的統治階級。今日，「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紛紛復辟當權，劉鄧路線再度得勢，且明目張膽的搞修正主義，批判極左的毛路線。中共很重視思想路線的鬭爭，既不能明顯的鞭毛屍，只有以林、江頂罪，對「文革」做徹底的否定。不僅報仇雪恨，更為修正主義路線樹碑立傳。

2. 以林、江集團爲共產暴政頂罪，而疏導民憤、民怨——十年「文革」鬭爭，固然鬭爭的重點是「黨內走資派」，但也造成了社會動亂，推動了極左的毛路線，使經濟瀕臨崩潰邊緣。鄧派藉這次審判，把今天的民窮財盡，昔日的恐怖鬭爭，都歸咎於「十年浩劫」，委過於林彪、江青集團，企圖集民怨於「文革」，而誘使民衆對鄧派及其路線寄以幻想。

3. 打擊林、江黨羽及「文革」期間崛起的政治勢力——「軍、幹、羣三結合」的奪權鬭爭，使軍隊幹部與羣衆鬭將湧上赤色舞臺，風派的「革命幹部」淪爲配角。十年之間，幹部結構的變化是空前的。三千八百萬黨員中，有半數是文革時期入黨的，紅衛兵和工農造反派頭頭形成一股新生政治勢力。鄧匪復辟以來，雖然藉地方黨委的改組和「革委會」的取消，瓦解「三結合」的幹部結構；但林系幹部和江青「文革派」餘黨仍是不可侮的勢力。尤以紅衛兵和工農造反派的「震派人物」，隨時可以觸發政治地震，故鄧派藉這次審判，擴大株連，以摧毀匪黨內潛在的反鄧勢力。

4. 對內對外顯示法制的假象——十名主犯在赤色舞臺消失，有的長達九年多，短期的也有四年多。不審不判、無法無天。年來，鄧派強調「社會主義法制」，今年一月開始實施「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因此圖藉這次審判表示：今日大陸已恢復了「法律與秩序」，並聲明審判不涉及黨內是非，「有法可依」。

5. 爲評價毛匪功過做準備工作——鄧派不對毛做斯大林式的鞭屍，但又要評斷毛的功過，因爲毛路線妨礙了鄧路線的發展。鄧派分毛路線爲四個階段，第一階段「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鬭爭」，使匪黨竊據大陸，第二階段以「土地改革」、「肅反鎮反」、「公私合營」的血腥鬭爭和掠奪，打下了共產政權的基礎。這都是鄧派所肯定的。第三階段自「反右鬭爭」至「三面紅旗」，這個階段的毛路線，鄧派認爲有對有錯，故一半肯定，一半否定。第四階段是「文革」鬭爭，劉鄧集團飽受鬭爭之苦，故全盤否定。鄧派的評毛，引起「凡是派」與無知幹部的疑惑、反對，形成中共內部思想的混亂。鄧派欲藉這次審判，否定「文革」路線。雖不直接審判毛，但使人認識毛是「未被起訴的主謀者」，這將減少將來評斷毛功過的阻力。

在審判前夕，鄧派如臨大敵，加強戒備。開庭次日、「北京日報」和「安徽電臺」公開呼籲民衆，嚴防林、江集團破壞搗亂，干擾審判。這是直接的影響。其它方面的反應與影響也頗複雜。

1. 對中共內部的影響——這次審判對鄧派所強調的「安定團結」，是一大諷刺；中共內部的反應與影響將因人而異：(1)以鄧爲首的復辟派，感到復仇的快慰，也可能提高鄧派的權勢聲望；但將擴大其黨內矛盾。(2)華雖是漏網之魚，但已使人感到：一個「文革」餘黨不宜連任中共的主席，這將加重華在「十二大」的去職壓力。(3)給與林彪系統的嚴重打擊；但也將擴大林系幹部的反鄧鬭爭。(4)紅衛兵和工農造反派形成的新生政治勢力，將受到一連串的株連、打擊，這將擴大鄧派與年輕一代的矛盾鬭爭。(5)藉「法制」之名，行「黨紀」之實。陰謀陽謀互用，中共權力鬭爭將更爲詭譎多變。

2. 對大陸民衆的影響——由於法律常識的缺乏，大陸一般民衆頗難區別「黨內鬭爭」與「法律審判」。十年「文革」造成的

動亂，是鄧派批林、批「四人幫」的藉口。這場審判更使林、江集團陷入「國人皆曰可殺」的地步。但是，沉默的大眾還是有判斷是非能力的。從這次審判中，民衆可以認識共產制度和權力鬭爭的醜惡面。鄧派企圖藉此審判疏解卅一年來共產暴政所造成的民憤、民怨，也是不可能的！

3. 對海外國際的影響——中共這次審判的宣傳，強調法制與秩序，可能獲得一些不明真相者的錯覺，但在海外和國際搞欺騙是不容易的，無人相信這是法律案件，一向偏袒共匪的日本大眾傳播工具就認爲這是政治審判，尤其這次審判，假「公開」，真「秘密」，不准外國記者採訪，只由中共自說自話，更引起國際輿論的批評。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編輯費爾，於審判前訪問鄧小平，對此事一再質問，即是一例。而「紐約時報」認爲這次審判無異審判共產制度的本身，更是中肯的論斷。

4. 對復興基地的影響——由於時空關係，復興基地一般民衆對大陸情況較爲隔膜，但仇恨中共的心理是可以肯定的。由於此種心理，此間看林、江集團受審，真是大快人心。而有關這次審判的外電報導，夾雜着外國人的觀點和「新華社」的鄧派宣傳調子，這就可能令人只注意被告的罪狀而忽略了原告的罪惡。

所謂受林、江集團誣陷迫害的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那一個不是滿手血腥？他們的垮，他們的死，都是罪有應得！在「文革」之前，「土地改革」、「肅反鎮反」一連串的血腥鬭爭，受迫害致殘、致死的大陸同胞，數以千萬計。那都是復辟派的罪行，他們更應該站在被告的行列中。

這次審判是「安定團結」假象的不打自招，是「社會主義法制」樣板的醜劇表演。審判如鬭爭，罪名多羅織。在權力鬭爭中的勝利者是「原告」，當「法官」；而失敗者是「被告」，先到監獄，再上「法庭」。律師不爲「被告」辯護，不認罪無證據照樣判刑。如此審判，不僅暴露中共權力鬭爭的真相，更顯出馬列主義共產制度的危機。

因爲中共堅持所謂「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沒有「民主」與「法制」，而中共也長期陷在反覆無常的鬭爭中。當年毛、林、江諸酋鬭爭劉、鄧「走資派」，今天劉、鄧「走資派」復辟當權又鬭爭林江集團。將來，這些復辟派也阻止不了另一次的鬭爭。

(三) 笠原正明：

「林、江集團」之審判爲鄧派主導，而「四人幫」之被捕則係華、葉所爲。「四人幫」被捕後不久，即有所謂「姚、張、江、王專案小組」進行調查，蒐集罪證。但其時華、葉僅擬予以批判，不想加以正式審判。鄧小平復出後，其實踐路線業經三中全會確定，四個現代化亦已開始推進，故其對「林、江集團」之處理，持有與華、葉不同的立場。例如鄧要批毛，但所批者僅爲晚年之毛路線；又如鄧爲了「四化」必須徹底否定「文革」，以免再受到「造反有理」者之困擾。這些立場都與華、葉有所差異。其次，鄧派在「文革」期間，受害至大；而華、葉在「四人幫」闖倒林彪之後，反而崛起掌權，可說是「文革」的受益者。因此

，鄧派對「四人幫」深惡痛絕，要處以死刑而後快；華葉最初連審判都不予考慮，自不贊成處以極刑。這樣一來，目前「林、江集團」的審判，又成了鄧和華葉鬭爭的舞臺，其結果對鄧的「四化」前途，對華葉的未來命運，都有密切的關係。

就當前情勢看，鄧在這次鬭爭中顯居上風。他爲了推進「四化」，不但要澈底否定「文革」，而且要把與「四人幫」有關的許多幹部，大加整肅，勢將引起巨大的風波。蘇俄的赫魯曉夫曾因個人獨裁而爲其幹部趕下臺去，鄧小平如對大批幹部進行整肅，亦可能遭到同樣命運。

（四）李廉：

中共想以審判「林、江集團」作爲權力鬭爭的結束，但自「四人幫」被捕直到「大審」開始的四年之間，權力鬭爭仍在不斷進行，而且充分表現在「四人幫」的審或不審，如何審，何時審，以及安排何種罪名之上。

華鄧兩派對於「四人幫」的評定即有不同的主張。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被捕的頭一年，此案交由汪東興主持的「姚、張、江、王專案小組」審查。此時中共的文件稱「四人幫」爲「極右派」。但到了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時，鄧派得勢，鄧小平路線獲得肯定，「四人幫」便被認爲犯了「極左」的錯誤。其實江青等自被捕之後，即已關入北平的秦城監獄，失去了行動的自由，自然不可能由「極右派」變爲「極左派」。其所以會變的原因，先是華國鋒繼承了毛路線，於是指江青「極右」；其後鄧小平要搞現代化，又指江青「極左」。這顯然是受了華鄧鬭爭的影響。

過去四年，中共在決定如何處理「四人幫」的過程之中，亦有許多變化。華當權之前，根本沒有打算把「四人幫」交付公審；直到一九七九年十月華訪歐前夕在記者會上首次透露將依法審訊，但表示不會處以死刑。由此可見，「四人幫」之受審，實爲華鄧妥協之結果。今年六月中共宣佈審判「林、江集團」正積極進行中；同月廿一日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透露至遲將於九月開審；其後鄧小平又對義大利記者表示審判定會舉行，但需要相當長的準備時間。至於罪證之蒐集，最初是由汪東興主持的專案小組負責（華派），後來又由「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重新調查（鄧派）。最後再交「公安部」進行蒐證。罪行亦由一百條減爲六十條，最後定爲四十八條。凡此審判時間的一延再延，調查蒐證機關的再三變更，以及所定罪行的增減，也都與華鄧兩派的鬭爭息息相關。

更值得注意的是，「四人幫」與林彪集團併爲一案，由歷史觀點，很難說得通。因爲（1）「四人幫」掌權是在一九七三年中共「四大」以後，其時林彪早已摔死，林派「四大金剛」均已入獄；（2）根據「五七一工程紀要」，張春橋及姚文元均爲林立果預定暗殺的對象。所以把「林、江集團」併案處理，實在非常牽強，但可支持下面三點意見：

1. 鄧派部署審「四人幫」爲一陰謀，旨在清掃打擊華國鋒的通道，以便倒華。鄧派如要將華自中共「黨主席」的位子上拉下

來，必須先解決兩個問題：第一華爲毛澤東指定的繼承人，要倒華就必須貶抑毛的地位；第二華是在「文革」時竄起而現仍當權的最後一人，要倒華就必須全面否定「文革」。現在將「四人幫」和林彪集團併案審判，正好實現鄧派的此一陰謀。

2. 「林、江集團」受審將導致共軍若干幹部的整肅，並將成爲地方上更多人受害的前奏。預料毛遠新會在某地受審，其他許多黨政幹恐亦難逃厄運。

3. 即使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中，鄧派倒華成功，亦不表示中共黨內的權力鬭爭，即可結束。相反的，中共從中央到基層的鬭爭，仍將持續下去，永無已時。

(五)高田富佐雄：

最近有一日本專家訪問大陸，正值「林、江集團」審判期間。他在廣州時，發現當地民衆並不收看有關審判的電視節目；問他們爲何不看，答以看了沒有意思。因爲大陸人民都知道這次審判不過是中共內部權力鬭爭的另一型態，不感興趣。這一專家在西安時曾問其導遊對魏京生的看法。答覆是魏的主張很對。問他如此發言，是否怕惹麻煩；答以他應該有發言的自由。

又據許多訪問過大陸的日本遊客說，他們曾經在街上問一些知識青年是不是中共黨員，答曰「不是」；再問爲何不入黨，答覆是當了黨員便會爲特權所腐化，不利於人民，故不入黨。

以上所說雖屬小事，但可以反映出大陸一般民衆的真實心態。中共內部不斷的權力鬭爭，不但削弱了大陸人民對它的信心，而且更將危及它存在的基礎。

(六)李天民：

審判「林、江集團」的主要目的是鄧小平的大報仇，並爲貶毛運動的再昇高，奠下法律基礎。鄧曾表示毛之過錯限於「文革」時期，而此次審判又將毛之過失與「林、江集團」分開，真是不可思議之事。在審判中，毛所指定之繼承人以及爲毛捉刀之秘書都受到牽連，而江青則說「奉命行事」，「夫債妻還」，明明是指毛而言。這些都可作爲鄧小平昇高批毛運動的依據。鄧在一九七七年「十一大」致閉幕詞時，第一句就說會議「在英明的主席華國鋒同志主持下成功閉幕」；「五中全會」以前，香港的附匪報刊都說華鄧「合作無間」。曾幾何時，華現在可能被迫下臺。這便顯示出華鄧鬭爭之經過，亦可暗示今日華之命運亦可能爲未來毛之命運。不過，批毛問題將是中共內部對立、矛盾、鬭爭之核心所在。鄧將繼續導演對毛某的批判，能否成功，固難逆料，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共在「反毛」和「保毛」的鬭爭中，「黨」又會被打得稀爛。

(七)山村治郎：

中共在面臨極大經濟困難之時，不思爲「四化」効力，反而表演此戲劇化的「大審」，足見其暴虐成性，非進行鬭爭不可。日本的自民黨也有權力鬭爭，但因有在野黨之制衡，故從未廢棄政務。目前中國大陸雖無在野黨，但有心懷不滿的廣大民衆，假如中共不予重視，則其前途不但暗淡，而且會充滿着危險。

(八)陳定中：

中共軍方對此次「大審」的反應，值得注意。「起訴書」除列有十六名主犯外，更包括六十名從犯，其中有毛遠新、康生的太太、謝富治的女兒，以及二十八名共軍頭目。這些頭目多爲軍中高級幹部如「後勤部長」、「海軍第二政委」、「空軍作戰司令員」等。此次「大審」之後，對此六十名從犯必將另加審判，因受審者多爲共軍幹部，可能引起軍中的強烈反應。

(九)張鎮邦：審判「林、江集團」是鄧派為召開「十二大」解決組織問題所採取的一個必要步驟。

中共審判林彪、江青集團，包含有多方面的作用；而其中一個主要的作用，就是通過這次的審判，把與林彪、江青集團有關的人，從中央到地方，通通發掘出來，爲明年上半年召開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解決組織問題掃清道路。因此，它是中共內部權力鬭爭的繼續，也代表着中共內部權力鬭爭的發展。

從組織的角度觀察，中共召開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首先必須解決下列三個問題。這就是：

第一，解除華國鋒黨主席的職務。「四人幫」被打倒之後，中共內部的權力鬭爭，主要是在以華國鋒爲代表的文革受益者與以鄧小平爲代表的文革受害者之間進行。經過過去兩年多的較量，由一九七八年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鄧小平一派所製訂的路線到今年二月底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將汪東興、陳錫聯、吳德、紀登奎四人在中共黨和政權中的領導職務解除，說明鄧小平一派業已居於上風。接着鄧派通過僞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以黨政分離爲藉口，把華國鋒的「國務院總理」職務拿掉，剩下一個問題就是鄧派還讓不讓華國鋒繼續擔任黨主席了。現在北平傳出來的消息是華國鋒已經辭去黨主席一職，可見鄧派決定要把黨主席這個職位掌握在自己手裏。表面看來，這件事似乎與審判林彪、江青集團無關，實則大有關係。大家知道，這次中共審判「四人幫」，沒有牽涉到天安門事件，這是因爲華國鋒當時擔任「國務院代總理兼公安部部長，應該對鎮壓天安門羣衆負責，

如果把這件事作爲「四人幫」的罪狀公開出來，就不能不把華國鋒拉進去。但在中共黨內，是一定要追究這件事的。這樣，鎮壓天安門羣衆就不能成爲華國鋒所犯的嚴重錯誤之一。加上「四人幫」打倒後，華仍犯有主張「反右批鄧」，領導「農業學大寨」的錯誤，以及「文革」以後兩年在經濟工作方面的失誤，鄧派就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迫使華國鋒下臺了。現在看來，華國鋒的下臺恐怕已成定局。問題是下臺之後他將在中共黨內居於何種地位，一時還難以作出準確的判斷。

第二，淨化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的成份。中共原先決定，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應在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底以前選舉完成。但迄至目前爲止，大陸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中，完成代表選舉的似乎只有黑龍江一省。鄧派要控制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首先必須做到由它的人或傾向於它的人來充當大會的代表。因此它在這個時候來審判林彪、江青集團，就是要把與林彪、「四人幫」集團有關的人，完全排除代表之外，這樣它就可以操縱所有的代表，在未來的大會中通過完全有利於它的決定。現在中共已經決定在林彪、「四人幫」集團審判結束之後，緊接着在地方一級進行對林彪、「四人幫」餘黨的審判，其有意用審判來影響大會代表的選舉，不是顯而易見嗎？

第三，不讓與林彪、「四人幫」有關連的人進入未來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是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最高權力機關，是黨的權力的基礎。這個「中央委員會」由那些人組成，對鄧派能否鞏固它未來的權力至關重要。而在中共的高級幹部中，有資格充當「中央委員」的人不在少數。鄧派不願意與林彪或「四人幫」有關係的人充當「中央委員」，以免成爲未來的心腹之患，這是大家可以想像得到的。因此，鄧派就利用這次的審判，把那些與林彪或「四人幫」有關連的人通通發掘出來，並以此爲理由，把他們完全排除出「中央委員」的候選名單，使他們無法當選爲「中央委員」，以保證鄧派在未來的「中央委員會」中，佔有絕大的優勢。這在現在看來，也是十分清楚的。

當然，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還不能把它今天在組織上存在的問題完全解決。因爲在今天中共三千八百萬黨員中，有一千八百萬是文革期間入黨內。鄧派認爲這些新黨員思想上深受林彪和「四人幫」的影響，絕大部份不合格，必須重新加以清理和教育。所以，我們可以預期，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過之後，中共將會在全黨範圍內開展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把那些他們視爲黨性不純的份子清除出黨。這就將使中共黨內的矛盾鬭爭，不是縮小，而是繼續擴大了。

(十) 蔡維屏：

中共公開審判「林、江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採用的方式是組織「法庭」，依據「刑法」及「刑事訴訟法」來處理，並且容許律師爲被告辯護。還特意將審判經過，利用電視及錄音帶等大衆傳播工具，廣事宣傳；其目的之一是想在國際上製造形象——走向「法治」之途——藉以改變西方國家對它的觀感。

不過，無論中共怎樣「依法辦事」，對於真正了解共產主義所謂「法律」及「法律制度」的人士來說，是徒勞而無功的。我們都知道，共產主義在根本上，是把法律當作促進社會主義以及實現共產主義的「工具」，而不是用以保障個人的自由與權利的。因此，一切「法律」與「司法制度」，都是要配合黨的政策路線，而且聽命於黨的領導的，其有效方式，就是控制立法與司法的機構及過程，使其完全沒有獨立的可能。這種情形，在公法與刑法方面，尤其是直接而絕對的。如此一來，所謂「依法」完全不是西方國家所想像的那麼一回事。

中共審判「林、江集團」，就是上述情形最好的例子。中共的「刑法」與「刑事訴訟法」的制訂以及各級檢察院與法院人員的任免等，都是受制於黨。

所以我們認為中共這次的審判，只是為達到既定的政治目的，由政治力量所組織的「法庭」，政治力量所指揮的「程序」，完成一次演出而已。

附：六十九年度中日學者座談會出席人員名單

日本國方面（按英文字母順序）：

伊達宗義	DATE MUNEYOSHI	拓殖大學教授
福永安祥	FUKUNAGA YASUYOSHI	明星大學教授
廣瀨一	HIROSE HAJIME	拓殖大學教授
伊原吉之助	IHARA KICHINOSUKE	帝塚山學院大學教授
石橋重雄	ISHIBASHI SHIGEO	拓殖大學教授
笠原正明	KASAHARA MASAKI	神戶外國語大學教授
小林正敏	KOBAYASHI MASATOSHI	駒澤大學教授
桑原壽二	KUWABARA TOSHIJI	中共問題專家
清水亮	SHIMIZU RYO	中共問題專家
高田富佐雄	TAKADA FUSAO	中共問題專家
山村治郎	YAMAMURA JIRO	國士館大學教授

中華民國方面（按筆劃順序）：

尹慶耀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俄情組召集人

airiti

中日學者「中國大陸問題」座談紀要

沈劍虹 李廉 李天民 姚孟軒 陳雨晨 陳定中 郭華倫 張京育 張鎮邦 張競立 蔡維屏 趙倩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國際組召集人

正聲廣播公司董事長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海洋學院教授

大陸問題專家

臺灣大學副教授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匪情組召集人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